

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

平津战役卷

历史，在北平拐弯

王宗仁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历史，在北平拐弯

REPORTAGES ON REVOLUTIONARY
STRUGGLE IN CHINA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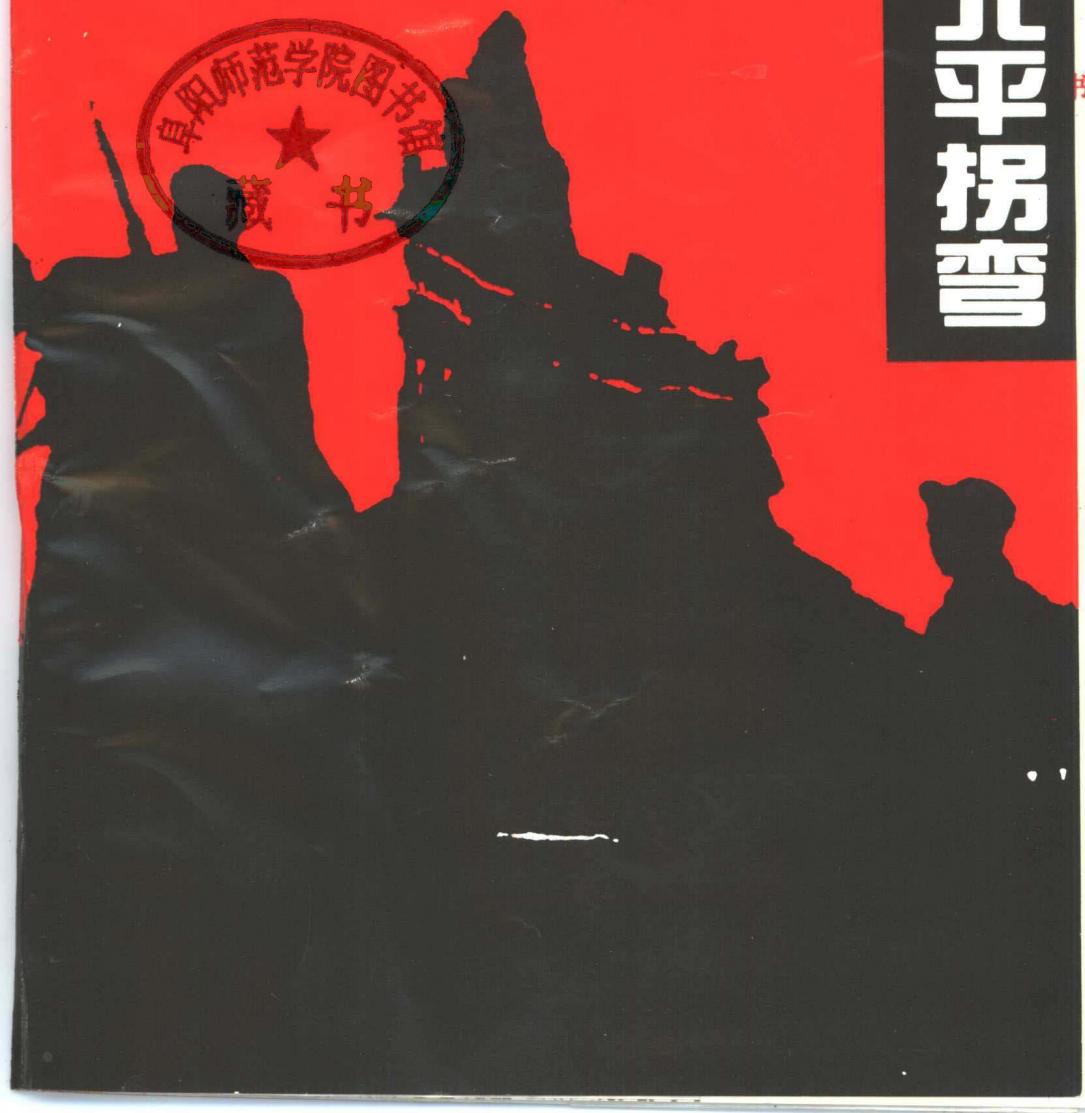
卷

历史，在北平拐弯

平津战役卷

王宗仁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 117 号

书 名：历史，在北平拐弯

著 者：王宗仁

出版者：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平安里 3 号 / 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：北京市中艺电子技术研究所

印刷者：北京宏伟胶印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出版社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 32

印 张：11.25

字 数：290 千字

版 次：1992 年 8 月第 2 版

印 次：1996 年 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 数：134001 — 144500

书 号：ISBN 7-5065-1952-6 / I · 238

定 价：12.80 元

背影还在地平线

(序)

我狂妄时，常常觉得自己很虚弱；

我冷静时，总是感到心里很充实。

但是，我永远也说不清自己身上的这两种素质谁多谁少。我只知道自己像需要充实一样，有时又少不了点虚弱；像离不开狂劲一样，有时又需要来点冷漠。

难道哪一个人不是在这样的心态中度过一生的？我要求自己在不停顿的探索中完成我自己的画像，也完成我作品主人公的画像。

那是1986年春天，解放军出版社问我能否承担创作长篇报告文学“平津战役”的任务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：我能写好它。

我很自信。就像当年我站在扶风中学操场跳远起跑线上那样，浑身尽是凝聚力、爆发力。我弹跳后并脚一跃，拿下了全校的亚军。同学、老师哗然，因为我是一个平时不露声色、几乎不去运动场的书呆子。运动场上的奇迹让这样的人创造出来似乎不好理解。然而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理解，这永远不可能。

源远流长。也许在9岁那年，当一把刺刀刺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已经有意无意地萌发了写写战争的想法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能感受到它的疼。

我能写好它。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人，心里是没有基石的。
故乡土地上的那场战争，使一个无知的娃娃早熟。那年，我
9岁。

呼唤东方古国黎明的枪声、炮声，在家乡的包谷地里震响起来。顷刻之间，刚才还绿得滋油的大地、蓝得发亮的天空就被战争涂抹得满是疤痕。

庄稼地烧成了结痂的焦土，板着苦乞的脸，发烫的弹壳在田禾苗星间冒着呛鼻的青烟；

大片的森林变成了一溜火海，火势下去了，留下树桩在有气无力地喘息；

牧童的短笛挂在残墙上，没有了红缨，也没有了竹体，只剩下一道烧焦烤干的印迹……

战争是一部教科书，坦克履带轧过浅草的烙怨，遮蔽天空的轰炸机群的影集，飞溅在关帝庙檐口滴着血的残臂……

有多少村民百姓连最后望一眼这个世界的权利都被剥夺，就倒在了血泊中——几分钟前，我还叫着他们“三爷”、“四姨”，而他们也在用那树皮似的粗硬的手指抚摸着我的头和臂膀。可是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再也看不到满地的苜蓿花了。他们的婆娘、娃娃，还有父老乡亲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了。

没有死在枪口下的人，只有出逃。

我跟着几个叔伯哥哥姐姐从冒着硝烟的村口慌张地跑出来。当那呛人的浓烈的弹药味甩在身后时，我想深深地呼吸几口田野里的清爽空气。可是，没有想到这儿的弹药气还是那么浓重。我们边走边咳嗽。一群渐渐缩小的背影走向阡陌纵横的远方。

后面，两个解放军战士追上来。

小娃娃不懂世事，以为凡是兵都要拿刺刀戳人。跑。我要活命。

两个战士不追了。可是，我们仍在不歇气地跑着。我们不在大路上跑，钻进了一片乱葬坟。

谁知墓穴里躲着两个伤兵。也许伤势不重，他们可以走动，拿着枪呢。我无法分清他们是国民党兵还是解放军，因为谁都可能为了遮人耳目而换上庄稼人的衣服，只有那亮闪闪的刺刀怪吓人的。

当我们这些逃亡者踏破古坟的静寂后，两个伤兵怒了。他们把寒光闪闪的刺刀伸到了我们几个娃娃面前。那决不是自卫，自卫怎能用刺刀抖威风？

我被吓哭了。

其实，我们和他俩都是逃命人，谁跟谁呀，干嘛跟我们这些娃娃过不去？

其他几个人都大我几岁，见势不妙甩下我跑了。他们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。

一片青纱帐。

我还在哭。两个兵用刺刀尖蹭我的下巴。我感到一阵麻麻的痛。用手一摸，血……一股暖暖的腥气。

我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感到生命就像悬在游丝上的秘密，说死很快就没命了。

那刺刀总算饶过了我，再没有蹭我别的地方。

就这样，我的下巴缺了一块肉。是被刺刀咬去的。至今那块缺口还在。永久性留念。

我恨死了那两个伤兵，也抱怨那两个追兵，干嘛不追到底呢？一直追下去，不仅保了我们，还能抓两个“舌头”。

这就是发生在秦川大地西端的扶眉战役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。我的家在扶风县城东源上的长命寺，它与法门寺遥遥相对。战争给一个乡村娃娃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永久的灰色记忆。在我正需要快乐地唱着歌的时候，它却塞给了我一把刺刀……

正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害怕刺刀。一想起乱葬坟里的那场遭遇，那已经长合、结疤的下巴还隐隐作痛，心也微微发颤。我把刺刀与战争划了等号。战争就是刺刀。

9岁的孩子眼里，有他的战争观。

可是，我又觉得好像应该感谢刺刀。扶眉战役之后，家乡的天空就变得格外瓦蓝、清晰了。如果说偶尔也有过飞云遮月的天气，但总是很快就过去了。而且过后乡亲们的脸上会浮现出更多更好看的菊花笑。我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平静而美好的环境中生活的。爬树掏喜鹊蛋，攀崖摘酸枣，下河摸鱼虾……有一次竟没有经过当民兵的六哥的允许，偷偷地摸出三八大盖放了一家伙。好险，差点把隔壁平娃哥的脑壳揭了。

无事的生活很平静。

我常常思念波涛。断不了做梦，梦中总是出现一排刺刀。想起刺刀，又是恨、怨与留恋交织在一起。

睡醒后，眼眶里含着两包泪水……

战争，就是这样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琢磨不透的谜。

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想知道扶眉战役之外的更多的故事。

后来，我听说了三大战役。

那是我迈进学校门槛之后的事。

小萝卜头的缨缨渐渐长高了，长壮了。这时，我知道了家乡之外的许多世事。也怪，所关心的竟然都是打仗的事。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、平津战役……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就是这时撞入我意识中的。我太幼稚，经历太浅，实在无法想象出这些战役的规模之宏大、枪声之猛烈、摧毁之残酷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扶眉战役就是最大的战场了，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么？

可是，我学的教科书上分明称它们是“三大战役”。不是有人说，解放战争中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战场吗？我开始领悟了。我眯起眼睛瞅着远处隐隐闪现的地平线，仿佛三大战役就在那里。

我的思想就这样从家乡的包谷地里走出来，到了淮海大地，踏进平津之门，步入辽沈山乡。我尽力地想象着、勾画着那些地方当年的一切。可是，我无能为力，像站在场院的麦垛上抓月亮一样无能为力。

我想了解三大战役，自然不仅仅是想看看那烧得秃湖的焦土、震得扭曲的公路、喘得颤抖的村庄……不仅仅是这些，因为这些我已经看够了。我相信，从那里可以挖出许多许多发生在战火中的故事。我太爱听故事了。小时候常常搂着奶奶的脖子让她讲故事。故事里所描述的世界是崭新的、神奇的，它可以使一个无法坐火车外出、无法乘飞机上天的人，了解到脚下这块土地之外的世界。奶奶总也满足不了我的要求，她说：

“你是个故事篓子，我是个故事篮子，奶奶不能给你装满。”

太形象了。她是篮子，我是篓子，我比她装得多。于是，我就不得不向外“扩张”了。再说，我想听的是“刺刀”的故事，奶奶那篮子里就更没有了。一辈子不出门的乡下老太太连“扶眉战役”这4个字都说不连贯呢。

穷能使人弯下身躯，也能使人挺起胸膛。脑子里多装故事能使我得到一笔财富。

我是太喜欢打仗的故事了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我好不容易买了一本《董存瑞》，看了不知多少遍。后来这本书被班里的同学传阅起来，等再转回到我手里时，书皮和前几页纸都飞了。就这，我又读了一遍。

我是个小小的好战分子！

那年我14岁，省城的文艺刊物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。然而我是多么不满意它啊！那里面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没有火药，没有硝烟。这样的作品太甜，太淡，缺少辣味。

可是，在此之前，我把自己写的乱葬坟里的故事投给几家报刊，却都挨着个儿地被退回来。我承认，我没有写好。但我也认为，那些编辑们有偏见。他们认为解放军怎么会追赶老百姓，说如果你把那两个兵改成国民党兵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了。

我没有动念头去改稿子。如果那样做，就等于我自己用刺刀去刺自己的心。那是在说谎啊！我不会说谎。十几岁的孩子往往比大人们更信奉真实。

唯其真实才有生命力。

所以，我要写战争文学的这颗种子是9岁那年播入心中的，是那两把刺刀挑起来的。我的下巴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块呢？

这大概是我执拗地真实地写战争文学的“遗传基因”。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心灵里保持一块幽静、纯真的领地。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。

我在看电影时，往往怀着极大的希望去，出来时却满腹疑惑：那里面的故事有几个是从乱葬坟里长出来的？

我以为故事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，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掉下来的故事没有根基。

失望并不是坏事。失望后萌发的希望更带有拼搏精神。

我终于逐渐地明白：

乱葬坟里的那两把刺刀是我写一部战争纪实文学的原始素材。

它也是一块酵母。

.....

日夜梦想的事现在变成现实了。

近1年来，我简直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，疯了似的到处乱窜。凡是可能去的当年的平津战场，我几乎都去过了。哪怕是望上一眼也满足。当然，30多年前的一切都荡然无存。旧貌换新颜。新颜和旧貌各有用场，无法替代。我需要的是旧貌，可是上哪儿去找？我常常面对着不是遗址的遗址，寻觅、追忆、思索。

思索使我的感情异常激动，激动又引起我更深的思索。

我大胆地猜测，大胆地发现。我要求自己的思维摆脱任何成见和偏执的束缚。

我在平津战场上漫步.....

当年的一切都消失了。

但是我要找回失去的一切。

在新保安。

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街走巷，我有时还不得不拐进那篷满葡萄架的陌生人家小院。一位老大娘像瞄上了小偷似的瞅着我。

可是，当年郭景云军长自杀的地方在哪里？

郭是傅作义将军的“王牌军”35军的军长，是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阵亡的最高将领。

我此次新保安之行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看一看郭景云倒下去的地方。人们传说：这位军长神气十足，自杀时，子弹穿过脑部，还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倒下……

我要看看这个地方。

不仅仅是为了联想和启迪。

可是，这个地方呢？

塞上寒风吹拂着小城。漫天雪花染白了天地。我穿着大衣还觉冷。

我询问几个青年人，他们像听一个从月球上采集到的故事一样摇头。80年代，就注定了郭景云的名字非得像没有出土的文物一样希罕吗？

我截住了一位胡须飘然的老者。他用奇怪而冷漠的目光看了我半天，才用手指指：

“在那儿！”

我多看了他几眼。像他这般年龄的人，新保安解放那年的事记得最清楚。说不定他还是郭景云抓去的一个民夫呢。今天，老人的周围是七彩的阳光和阳光落地时发出的声响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对我那样的不友好。他为什么要去追忆那阴冷的往事呢？

我顺着他的指的方向望去。

胡同，民房，大楼……

几缕轻烟从一堵高墙内缓缓飘出，像一首朦胧诗。

我已经在新保安城里跑了半天了。

我望着炊烟升起的地方沉思。

也许就在那里，掩埋着一个连今天的主人也不知道的故事。

郭景云死得也算壮烈吗？

他是拍着胸脯走进新保安的。35军在傅作义心目中的地位、分量，这位军长比谁都能掂量出。他曾夸海口：

“与共军决一死战，守住新保安！新保安如果失守，我郭景云马上自杀，你们也得跟着我学！”

他要求他的部下跟着他一起走进坟墓。

郭景云到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那是在掩蔽部里，他用自己的手枪送自己走上了远路。

郭景云死了，解放军战士把他尸体上的血迹洗干净，穿上将军服，装进一具当时在新保安城里算是上乘的棺木里，埋在了火车站。北平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又帮着她的女儿把灵柩运回北京。如今，这位军长躺在北京西郊。

他该满足了！

解放军的多少官兵死在他的炮火中？恐怕郭军长是未来得及算这个帐的。他的官兵又有几人给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擦洗过血迹

.....

郭军长是永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。那么他手下的如今还健在的人，为什么不替军长说句话？

据说，郭景云在掩蔽部扣动了扳机之后，北平总部的电话正好拨通到了他的桌子上。说不定还是傅作义要和他通话呢。

但是，电线断了，永远地断了.....

谁也搞不清北平总部的电话要说什么。

世界上的谜太多了。只有有勇气活下去的人才有可能揭开这些谜。

.....

我在新保安城里寻找郭景云的自尽处。可是，我找不到。

这场大雪把这座塞外小城装饰得美丽、圣洁。臃肿的雪使每一条胡同都显得比平日窄狭、短粗。地面的积雪上留着片片零乱的脚印。

那里面就有我寻觅的足迹。

我从一条胡同走出，又拐进了另一条胡同。这儿的住户更稠密，长长的街路望不到尽头。我缓慢走着，张望着，寻找着历史失落的那一页。不为别的，只想抹掉上面的灰尘，让它显出本来的面目。蒙上沙尘的玉石仍然是玉石。可是，历史被遮去真面目就变形了。

一阵唧唧喳喳的叫声牵去了我的视线。一群身穿花衣服的孩子从一扇小门里跑出来。他们是幼儿园的小天使，是这小城冬景中的小溪。老师带着孩子到南墙根下晒太阳。柔柔的阳光射在孩子们脸上、身上，也射在孩子们的歌声上。

我突然想到，应该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也许他们不喜欢的故事——当年郭景云在这里扣动了击毙自己的扳机。

我迈开大步朝着那洒满阳光的地方奔去。有些溺爱子女的母亲总是担心子女被风吹日晒。我倒真想把孩子们带到枪炮声中去

.....

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看看的那个地方。

在天津。

我同样在寻觅。当年生擒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的那间地下室呢？

我的腿已经跑麻木了。这是第3日了，还没有任何结果。

我的心头涌上几分失望。我问自己：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今日这里修一个纪念馆，明日那里建一个展览室，为什么就轮不到在这些地方盖一间房？哪怕插一块木板，上面写几个字也行。想了解历史的人最怕仅仅得到一个背影。

我不希望天上的月亮永远满盈。

我不愿意离奇的神话代代相传。

我只要求看到任何一次历史转机时期的真实的记载。

我在天津城里漫游。我已经很疲累了，但是我要自己还要走下去，因为我仍然没有找到那间地下室。

大海捞针。

我拨了数不清的电话，挤了不知多少公共汽车，得到的答案起码也有 10 多个。地下室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怎么藏得这么深？

总还有人记得陈长捷。是一位退休老人。

他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：

“地下室就在‘八一’礼堂那一带！”

我去寻找“那一带”。一片军营。军营地盘之外，又是高楼林立，望不到边的城市之光。那个小小的地下室不知被挤到哪个角落里埋葬了。

“八一”礼堂在天津市民的概念里是一个大片军营的泛指，也是一个地区的概念。

我在汽车站上等来了一批又一批乘车人，打问，求寻，都没有结果。就像只有站在大山的行列里才会真正理解大山的感情和思想一样，当我找不到陈长捷的地下室时才感到这位司令是那样的不可琢磨。

次日，我又去了……

我曾 4 次在“八一”礼堂附近走动、了望。军营门口的哨兵死死盯着我，仿佛从我身上发现了什么疑点。我走了，悄悄地走了。

又一个解不开的谜。

月亮漂在水里，我拨开水面，月却离开我更深了一层。

我没有能耐、也没有精力去挖掘这个地下室了。没有收获不也是一种收获吗？

于是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下都埋藏着许多有待整理的并不古老的故事。

陈长捷是被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堵在地下室里活捉的。据说，这位天津守敌的最高司令官在意识到自己已成了“共军”的俘虏的时候，正坐在一个黑色皮革包裹的转椅上。他脸上一直浮着笑容，那笑还带着几分轻松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

笑时，他的目光里有一个几乎无法追踪的漩涡。他为什么笑，面对着血泊，面对着监狱，甚至面对着死亡……

这也是个谜。

后来，战士们押着他走出地下室，他还要坐自己的小汽车。当时他的小汽车就停在旁边。

押他的战士理所当然地没有满足他的要求。他不恼也不火，就那么地走了。

今天，我在天津城里漫步、寻找。当然不是找陈长捷的笑。真正会笑的人在最后已经笑了。

我好像得到了一把钥匙。

我要找的是这笑的背后隐藏着什么。

也许是经过这几番的折腾之后的报应吧。在北京，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傅作义将军在平津大战时住过的总部；但是，我无法进去。

高大、威严的红墙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只好在高墙外踱步、猜测、遐想：这墙是怎么变红的？

在长安街上，我看到人们脸上富有动感的笑容是那样的柔美灿烂。

傅将军是一个伟人。他在平津大战时是不是使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？不敢说。但是，他在这里确实是使尽了力气，为即将倾倒的王朝大声呼叫。

这呼叫我在新保安、张家口采访时听到了，在天津采访时也听到了。

我在写这部书的整个过程中，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一直听

到了将军的这呼叫。

这呼叫虽然是声嘶力竭的，但毕竟没有使傅将军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，也没有使蒋总裁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。

当然，当傅将军把解放军迎进北平，特别是在他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那双柔柔的大手时，他的呼叫就永远地中止了。

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他即将结束旧的生命的时候悲怆地哭了，紧紧攥着腰间的手枪哭了。在他的泪眼中，北平的城头披红挂彩好耀眼。

我是一心一意想看看将军当年的那座宫殿的。可是，历史却又一次给了我一个背影，让我从背影去想象远征的队伍，去追忆东行的使臣……

当我没有完全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时，我找出了新的理论根据：我从扔在路边的残片中看到了一切。

平津战役是一部无字的书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这是一部酣睡的巨著。博大的沉闷，永恒的孤寂，一片片等待着人们深翻、耕耘的荒漠。它既有似乎在天涯又仿佛在耳畔的枪声，又有似乎在天上又仿佛在地下的歌声。

可以在这里写上支离破碎的文字，也可以在这里写上宏伟壮丽的史诗。

可是我只求从这里挖掘到真实、动人的故事。正是出于这种心情，我才把扶眉战役中那个亲身经历的小插曲放在了这里。它只不过是一颗小星星，但它能引来最动荡最迷人的月光。

今天，当我翻开这部沉睡的大书时，那些故事像一群野马嘶鸣着从我心上踏过。

那是枪声。枪声埋葬了人间的又一个冬天。

枪声过后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春天。

作者简介

王宗仁 1939年出生。陕西省扶风县人。195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。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。

14岁发表处女作。主要从事报告文学、散文创作。著有11部散文集、5部报告文学集。1980年，作品《写在她远行的路上》(与人合作)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。



王宗仁
